

综述
焦点
史学
社会
政治
经济
文化
人物
争鸣
索引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钱蓉 主编

观点

2003·历史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3·历史

观点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钱蓉 主编



福建人民出版社

K207
Q222

Qat38/03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观点——2003·历史/钱蓉主编.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4. 5

ISBN 7-211-04691-0

I. 观… II. 钱… III. 史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873 号

观点——2003·历史

GUANDIAN 2003 · LISHI

钱蓉 主编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三明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 365001)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0 25 印张 229 千字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 211 04691-0
C·94 定价: 1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综 述	2003 年的中国史学 ····· 张 研 毛立平	1
焦 点	盛世修史是中国历代优良传统 ·····	11
	《清史》纂修将推动清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12
	《清史》的编纂原则 ·····	13
	《清史》编纂的指导思想 ·····	15
	纂修清史工程的步骤 ·····	17
	《清史》编纂的体例及其创新 ·····	18
	《清史》入传人物时限标准 ·····	20
	甲午战败的责任不应由翁同龢来负 ·····	21
史 学	中华文明的起源是一万年 ·····	23
	唯物史观是一个开放的理论系统 ·····	24
	史学研究应注重“实”与“虚”的结合 ·····	26
	口述史学的传统及其前景 ·····	27
	繁荣地方史学的八条建议 ·····	29
	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形成 ·····	30
社 会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豪族与游侠 ·····	32
	唐代冥婚盛行的原因 ·····	33
	唐代蝗灾与国家兴衰 ·····	34

中国古代女性休闲方式及其特点	36
晚清市镇权力网络的变迁	37
中国公共卫生事业近化代之滥觞	38
清代育婴堂的经营特点	39
清末瘟疫与民众心态	41
麻风隔离与近代中国	42
中国古代对流行病的防范	43
近代城市交通工具用语的形成	45
照相在清末民初社会管理中的作用	46
五四时期的废娼呼声与现实启迪	47
中国科学社推进了中国科学的近代化	48
百年接力留学潮	50

政 治

要理性看待古代盛世	53
大同与小康：中国传统社会的理想	54
后妃干政是对母权的肯定	56
宋代皇后临朝听政具有封建合法性	58
汉武帝是否独尊儒术？	59
“九品官人法”名称考	61
宽容政策是唐朝开创盛世的根本原因	62
“术用化”是清流思想的基本倾向	64
李鸿章、张荫桓的“受贿”问题	65
英军焚毁圆明园主要是给清政府以精神打击	66
1840~1860 年间清政府的外交体制	67
清朝驻日使臣的派遣和领事裁判权的行使	69
清廷是同治朝觐见礼仪之争的失败者	70

	清末戊戌、己亥年间“废立”传闻探析	71
	太平天国的职官制度有开创之功	73
	攻打使馆的是清军不是义和团	74
	广东商团及“大商团主义”	75
	胡绳晚年对中国国民党的新评价	76
	民国初年的部院之争	77
	国民政府乡村整合失败的原因	79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高级文官的投敌	80
经 济	历史发展中长江三峡的人地关系	81
	明清江南地区与其他区域的经济交流密切··	82
	从《姑苏繁华图》看清代苏州城市工商繁荣··	83
	南通：中国城市近现代化的典范	85
	晚清商办与官办的斗争	86
	近代上海时髦消费主义对经济产生影响	87
	清季对铁路外债的态度	89
	翁文灏在战前经济备战中的贡献	90
	西北开发在抗战前已经受到重视	91
	近代华北商品市场发育的不平衡性	92
文 化	中国古代和亲文化影响的特点	94
	中国古代设馆修史的功过得失	95
	传世文献中记载过洞庭郡	96
	科举制的定义	97
	明代学校生员的别称	99
	清末留日医学生对中国近代医学事业的贡献··	100

晚明士大夫与“天学”的传播	101
“西学东渐”的效果有限	102
近代商人的办学特色	104
清末民初士绅与江南乡镇教育的近代化 ...	105
现代新儒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省	106
20 世纪 30 年代《大公报》的思想倾向	107
新保守主义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评价	108
“救国”与“救人”	109

人 物

严复仕途不畅的原因	111
李秀成是个有污点的英雄	112
梁启超晚年思想的转变	113
张之洞:晚清统治阶级改革派的殿军	115
叶名琛是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	116
马建忠的海防思想	118
儒家价值的乌托邦色彩是张謇失败的原因...	119
袁世凯辛亥复出的条件	120
日本记者笔下的袁世凯	121
汪精卫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	122

争 鸣

“商战”一词由曾国藩首创	124
“商战”一词不是曾国藩首创	126
以阶级分析的方法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128
以历史唯物主义还原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	130
跟不上学术步伐的《康有为传》	133
可以用改良主义评价康有为	134

1888 年康有为在北京的活动	136
康有为 1888 年的上书活动	138
发展的英国与内卷化的中国	141
世界经济史中的近世江南	143
郭璞永嘉郡卜城说质疑	145
郭璞永嘉郡卜城史实不容否定	147

索 引 	150
-------------	-----

2003 年的中国史学

张 研 毛立平*

2003 年是新世纪中国历史学承前启后的一年。所谓承前,是指继续对 20 世纪史学遗产进行清理和检讨;所谓启后,即本年度的许多研究均反映出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和研究方向。承前启后意味着过渡性和不确定,但也昭示着新的突破及其开放性。

一、继续清理和检讨 20 世纪史学遗产

2003 年伊始,中国史学界的重要阵地《历史研究》杂志刊登了“新世纪的中国历史学——挑战与思考”学术讨论会的部分论文。这些论文的主旨是继续清理和检讨 20 世纪史学遗产。

商传《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①认为,传统史学与新史学并不存在绝对的分野,而体现出一种相对的关系:任何史学研究或叙述方法在其产生之初,都应视作新史学;当其取得史学主流地位之后,对于其后所产生的新史学方法而言,便成为传统史学。现代西方新史学与传统史学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超越了单一的实证与叙述史学方法,走向了跨学科的研究领域。20 世纪发生了三次新史学高潮:发端是梁启超发表《新史学》;第二次是中国引进马克思主义之后;第三次则是现在。三次新史学高潮,虽均为引进西方史学观念,但其所针对之传统史学则亦在变化之中。作者在肯定学术多元化、多种方法论的运用成为未来史学发展趋势的同时,认为目前就方法论而言,新史学

* 张研,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毛立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讲师,博士。

① 商传:《史学传统与晚明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并未完全改变实证史学的整体模式，对于多数历史学者而言，其仅仅作为传统史学研究的补充。在晚明史研究领域，其发端始于谢国桢、孟森等人。就内容而言，涉及女性、社会风气、党社与社会阶级阶层等社会史范畴；就研究方法而言，除利用正史、野史资料外，亦十分重视家谱、族谱与社会调查。明中期以前的历史，与前代有一脉相承的共通性，而晚明历史却与近代社会颇有渊源相通之处。20世纪80年代以后，最早对晚明史进行较为深入研究的是海外及台湾学者，随着大陆社会史研究的兴起，一些学者也开始对晚明历史进行深入研究。作者主张以新史学方法研究晚明史，着重从社会、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尤注重对晚明社会的转型期特点进行研究。

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① 阐述了中国生态史学的发展流变及未来走向。中国古代史家就表现出对生态史的关注，如司马迁、班固、沈括等人。许多早期文献亦记载了生态环境及其演变过程、古人生态观念等，但整体仍停留在片断遗存的低水平。20世纪对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迁的研究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如蒙文通的《中国古代北方气候方略》、竺可桢的《中国历史上之气候变迁》等。除此之外，若干历史自然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历史时期动植物分布等研究亦不同程度地推进了生态史研究。新世纪以来日益突出的能源问题、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已成为世界性的文化思潮，同时也为中国生态史研究提供了时代契机。作者认为，生态史和社会史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关联性，生态史学在新世纪的进步，仍有待于若干理论问题的不断突破和解决。具体说来，如有关“地理环境”对社会历史的作用、有关生态条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自然科学研究的不断进步，等等。

^① 王子今：《中国生态史学的进步及其意义——以秦汉生态史研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继 2002 年台湾学者对台湾史学 50 年的发展做出评价后,香港学者郭少棠的《文化的冲击与超越:当代香港史学》^①也对上世纪的香港史学研究进行了回溯。他指出,钱穆于 1949 年在香港创办新亚书院,标志着香港中国史学从无到有的划时代转化。20 世纪 60 年代,香港史家继承了大陆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学研究、考据训诂及史料学派的史学传统,再加上本地史论派浓厚的文化民族主义色彩,奠定了香港史学的发展基础。同内地、台湾相比较,香港史学界的最大特色在于拥有宽松的政治环境和自由的学术空气。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将承认或强调主体意识的认识同历史唯心主义相联系,往往忽略了历史认识主体的主体意识及创造性。于沛《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②对这一误区进行了批判与反思,认为历史观念的进步、史学思想的发展、史学理论的创新都离不开历史认识主体意识的提高和加强。史学家是历史的产物,其主体意识虽然通过个人表现出来,却有明显的社会意义,且其水平直接决定历史研究的水平。加强主体意识的途径有二:一是全面、系统地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二是要有强烈的理论创新欲望和行动。创造的目的不是要脱离具有客观性质的历史,而是要使主体认识的结果更接近客观的历史本质,而这一切都将建立在正确的理论前提和文献实证基础之上。

谢维扬《21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重要问题》^③回顾了 20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指出古史研究在一些“更具全局性的、至关重要的、基本的问题上”远未得出完整、确定的结论。他梳理了 20 世纪中国古史的研究脉络——从中国古史的核心问题之一,即针对是否存在夏王朝而产生的中外学者间认识的分歧,到王国维提出以“二重

① 郭少棠:《文化的冲击与超越:当代香港史学》,《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② 于沛:《历史认识:主体意识和主体的创造性》,《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③ 谢维扬:《21 世纪中国古史研究面对的重要问题》,《历史研究》2003 年第 1 期。

证据法”研究中国古史，再到郭沫若通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史的贡献，直至20世纪70年代以后古史研究的新进展，认为：新世纪古史研究取得突破的关键，在于研究者须对不断发现的中国古代早期文献文本进行史科学基本概念的深刻反思。打破古史史料观的惟一出路，在于通过对新出土文献的研究，来检讨和重新建立古史史科学完整的概念体系。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加强对古书成书情况的再认识，因为过去传统辨伪学的成果并不理想；其次是解释性工作的水准与跨学科研究的要求。研究者应在加强“描述性”工作的同时，努力提高“解释性”工作的水准，而其核心在于建立概念及术语体系，其中涉及“话题”和“意义”两个核心。作者完全赞同在中国古史研究领域中进行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充分融合。

其后，本年度继续发表了大量回顾上个世纪史学研究的文章。如李金铮和邹晓昇从土地关系、租佃关系和雇佣关系、小农经营与经营式农场、农业生产水平、家庭手工业、农产品商品化与乡村市场、乡村借贷关系等七个方面，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近代乡村经济史做出“清理和简评”，深化了该领域的研究。^①

周天游和孙福喜则细致地回顾了20世纪的秦汉史研究。^②20世纪初年，在梁启超“史学革命”思想影响下，秦汉史研究领域大大拓展，从帝王将相家谱式的单一政治史，扩展为经济史、思想文化史、民族史、社会史、中外关系史等各专史的研究。研究方法在乾嘉考据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近代西方的史学方法和观念，创立了“实证史学”；王国维等人提倡的“二重证据法”，大大丰富了秦汉史研究的史料内容，强调将出土文物——简牍、石刻、封泥、铁器、货币等及文化遗址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互相参证。新中国成立之后，马克思主

① 李金铮、邹晓昇：《20年来中国乡村经济史的新探索》，《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

② 周天游、孙福喜：《20世纪的中国秦汉史研究》，《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义成为史学的指导思想，秦汉史研究亦不例外。这一时期的秦汉史研究主要集中在秦汉国家的政治性质、秦汉社会的主导生产关系、商鞅变法、“重农抑商”政策、秦汉社会的阶级矛盾和农民战争等方面，在秦汉社会结构、物质生活、阶级关系及思想意识等研究领域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台港秦汉史学者在劳干、钱穆等倡导下，以传统史学为依归，取得丰硕的研究成果。20世纪60年代以后，台港学者既注重传统史学的基本功训练，又注意吸收欧美史学研究的新理论、新方法，虽人数不多，但做到了少而精，成为20世纪中国秦汉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80年代之后，大陆秦汉史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积极吸收外来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重视从微观入手，在官制、赋役制度、法律制度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家族史、宗教史、风俗史、文化史、社会史等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随着许多重大考古资料的公布，史料内容大大丰富，同时成立了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相继创立了《秦汉史论丛》、《秦汉史译文集》等研究刊物。作者对21世纪的秦汉史研究做出前瞻与展望，希望东汉史研究在新世纪取得重大突破，改变学界重秦和前汉而忽视后汉的格局。作者认为，新世纪的秦汉史研究将集中于人与自然环境、人们具体的物质生产与生活状况、人与人之间更细微的关系、人们的精神信仰与自然及社会之间更细微的关系等领域展开。

二、新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趋势：多学科渗透与跨学科研究

新世纪的中国史学研究发生重大转化的标志之一便是历史学开始与其他社会科学相互交融渗透，研究方法和解释工具日益多元化，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如经济史与经济学、社会史与社会学、区域史与人类学间的合作越来越密切。然而，多学科渗透与跨学科研究带来的另一后果是，史学与其他学科间的边界日益模糊。如何坚持史学的主体性，成为新世纪史学发展所必须面对的课题。下面以历史学与考古学的关系为例，看看学者对此问题的认识。

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

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①一文，从考古学的立场，对多学科渗透进行了反思。考古学研究应同历史学、人类学更紧密联合，还是应返回资料本身，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20世纪80年代之前，考古学家俞伟超和张忠培都提出了重视考古学中的“文化因素”，强调“文化因素”与类型的关联。20世纪80年代之后，二人都对考古学从过去模式中走出新路做出了努力，在对待考古学运用现代科技对环境、聚落进行研究的态度及对考古学内容的理解，均无实质性区别。二者的分歧在于，俞伟超主张更广泛、全面地联合历史学和人类学，进行多学科“合流”；而张忠培主张返回考古资料本身，建立考古学自己的理论体系。分歧背后其实是考古学应该是独立学科还是历史学的一个分支或“二级学科”。查晓英指出，李济从文化人类学观点出发解释考古资料的方法具有深远影响，但并未得到大陆考古学界的充分认可。20世纪中国考古学中一直存在着强调发掘本身和出土材料倾向。1949年之后的三四十年主要致力于建立以实物为基础的文化序列。与此同时，台湾学者却进行了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沟通，其中主要是考古学与历史学间的关系。臧振华明确提出“社会科学取向的中国考古学”，以区别于“历史取向的考古学”。夏鼐认为中国考古学有历史学和人类学两个传统，但更强调考古学的独立性。近年海峡两岸的考古学者不约而同关注考古学的学科认同及学科发展与社会思潮间的密切关系。考古学者李零认为，考古学“是一门时间跨度很大，空间范围很广，求之细则无穷细，推之广则无穷广，因而在本质上是开放的，没有最终结论的，不断丰富其细节，也不断调整其框架的大学问”。

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②一文，则从历史学的立场，对历史学与考古学间的关系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历史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历史学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狭义历史

① 查晓英：《20世纪末关于中国考古学走向的争论——以俞伟超和张忠培的观点为中心》，《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② 朱凤瀚：《论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历史研究》2003年第1期。

学是依靠文献资料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学科。作者着重分析了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间的复杂关系。欧洲考古学基本归属历史学,美洲考古学多归属人类学。中国学者则认为,现代考古学在研究范畴、方法与技术手段上都超越了历史学本身。“现代考古学本质上仍当归入人文科学,亦即广义历史学中”。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界乃至国际学术界,围绕中国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相互关系展开热烈讨论,而夏商周断代工程更激化了中国考古学是否为科学、是否为历史学附庸的争论。按照研究对象的时段差别,考古学分为史前考古学、原史考古学和历史考古学三部分。历史考古学时段从商至明,其与历史学一起构成了研究历史时代的双翼。原史考古学与狭义历史学的关系则成为争论热点,特别是国外学者对夏文化是否存在提出质疑。作者赞同考古学与历史学不能割裂的说法,二者应该也能够找到一个科学的结合点。二者的关系应是“狭义历史学要通过考古学得到印证与检验,而原史与历史考古学则要以历史文献记载为确定课题与研究途径的重要参考,在上升到研究层面时也需要借狭义历史学做诠释。中国原史与历史考古学研究似乎不必为了追求‘纯洁’与独立的地位而刻意造成一种绝缘于丰富历史文献之外的学问”。近年来中国考古学与历史学密切沟通与合作的努力,将成为新世纪中国历史科学极为重要的新进展。

三、新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热点:社会史与文化史

2003年社会史与文化史继续成为史学研究的热点,并代表了新世纪中国史学的研究方向。

社会史与文化史研究在史学研究中形成了热点。这不仅仅在于有了各专门史近百年发展的雄厚的学术基础,而且在于社会大变革时期,民族、人民对综合性的历史研究“隐含”着的“渴求”。

由于社会史与文化史属综合性的学科的特点,在不少人眼中,社会史与文化史几乎无所不包。一方面,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都可以归纳到社会史中,都属于社会史范围,特别是其他旧有专门史不研究的生活、民俗、基层民众等均在社会史找到了归宿。有人只好以

广义的社会、狭义的社会、大社会、小社会、基层社会、秘密社会等加以界定和区分。另一方面，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等，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角度又都可以归纳到文化中，都属于文化史范围，其他旧有专门史不研究的生活、民俗、基层民众等也均在文化史中找到了归宿，什么西瓜文化、蝎子文化等应有尽有。有人也只好以广义的文化、狭义的文化、大文化、亚文化、俗文化等加以界定和区分。这样，社会史与文化史似乎成了或包罗万象、或拾遗补阙、或与历史和各专门史及它们自己彼此之间相互重复可互相取代、而可有可无的学科。

以社会史研究为例。一些学者最初从容易上手的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等所谓“剩余领域”进入社会史研究，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们发觉走到了尽头。比如年节习俗，细致细致再细致、横向纵向、分地区分阶层、这么着那么着描述之后，再没有话可说，需要“改行”了。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不知道社会史究竟研究什么，究竟要解决什么问题。如孤立地“铺叙”年节习俗，不涉及它与其他事物、与社会的关系，不涉及它对社会的影响，没有太多的意义，甚至从本质上不能称之为社会史研究。

一些学者隐隐感到了社会史研究有独特的研究对象和目的，但归纳不到“综合性”，于是反向提出，研究社会史要从整体上出发和考虑。他们认为不存在实在的社会，认为社会是“虚”的，是在具体研究中被人们认识的。事实上，人们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通过血缘、地缘、业缘，相互联系起来，构成了社会。社会调整人们的矛盾、冲突、对立，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交往。社会多种要素功能的发挥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推动着社会运行。社会运行包括纵向运行——社会的变迁与发展；横向运行——社会在诸要素交互作用下所保持的动态的平衡。

那么，如何认识社会史研究呢？首先应明确社会史学在历史学三个层次中所处的地位及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第一，位于第二层次的

社会史学与位于上一层次即第一层次历史学的关系。二者虽然都着眼于社会历史运行的规律，但研究的方向不同。社会史学研究某一个阶段社会历史运行的规律；历史学研究整体上的社会历史运行的规律。社会史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特殊与一般的关系，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第二，位于第二层次的社会史学与位于同一层次文化史学的关系。二者虽然都是综合性的学科，但研究的角度不同。社会史学偏重于社会——社会的运行和发展。文化史学偏重于人——人类生活方式思想方式的遗传变异和影响。社会史学与文化史学的关系是平行的关系，同样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第三，位于第二层次的社会史学与位于下一层次即第三层次政治史学、经济史学等专门史学的关系。可以说，社会史学与各专门史学的关系是综合性学科与专门性学科的关系。政治史学、经济史学等专门学科对本学科研究对象进行全面研究。社会史学对政治史、经济史等学科中涉及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现象、问题进行综合研究。它们仍然既不能等同，也不能相互取代。

这样，社会史学的地位便明晰而突出出来。社会史学不是一门包罗万象或可有可无或拾遗补阙的学问，也不是一门与其他学科相重复、可以为其他学科所替代的学问。社会史学是有自己独特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途径的学科和科学。

社会史学，应该是研究历史上社会运行和发展规律的综合性的具体科学。其中“综合性”，是站在应有的理论高度，对社会，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科学群”，乃至对社会现象、社会行为以及社会生活、社会风俗等所谓“剩余领域”，进行从微观到宏观、整体上理论上的研究和把握；“具体”科学，有别于研究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历史唯物论，它研究的是具体某一个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特殊规律，是以历史唯物论为指导，从这一社会运行和发展的特殊角度，对其他社会科学进行的概括和总结。

也就是说，社会史研究的独特对象，是历史上的社会运行（包